



隋代文学研究

李建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隋代文学研究

李建国 著



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代文学研究 / 李建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161 - 2735 - 3

I. ①隋…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隋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83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33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隋帝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从文帝杨坚开国（581年）到炀帝杨广亡国（618年），不过历时两代三十七年。大概与这个朝代在政治上的昙花一现有某种连带关系，隋代文学也常被人忽略，似乎在风花雪月的南朝和昂扬盛大的唐之间，它只是一个匆匆的过渡。而事实上，隋的不少文士，本即梁、陈旧人；至如虞世南、李百药等诗坛大家，更在唐初显赫一时，隋也就成了他们中年暂时栖身的一个客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常被人提起的话头，那就是此时虽然是北方人坐天下，但诗文领地却颇受南方轻靡风气的影响，特别是在炀帝一朝，不少诗人吟唱的诗篇多趋向轻软华丽一途。这样一来，就常在整体上被后来力倡风骨的盛唐人看轻，也被更后来学盛唐学汉魏的诗人和批评家看轻。而隋代文学的一些真面貌、新特点，也就这样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遮掩起来。

当然，也不是没有深心大力的研究者。陈寅恪先生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即推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大著，对“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之“吾国中古极盛之世”的隋唐两朝制度渊源，进行细密而深入的考察；他如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崔瑞德教授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亦就此期社会政治文化深耕细作，多有发明；而从文学角度予以探究者，如曹道衡、沈玉成二先生之《南北朝文学史》，杜晓勤教授之《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在涉及隋代文学时均不乏深度和新见。不过，其间亦有未尽如人意处：前者多致力于社会政治，于文学较少用功；后者虽重在文学，但主要方向在南北朝或初唐，因而，还算不得研究隋代文学的专著。如此看来，李建国副教授推出的这部《隋代文学研究》，作为从整体上集中研究隋代文学的第一部专著，便很有些开荒拓宇或将相关研究向纵深掘进的性质了。

从《隋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架构看，作者以三编九章二十九节统摄全书，其中上编四章从整体着眼，重点考察隋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士人生存状态和群体命运、文学基本格局和三大渊源；中编三章由总而分，对山东、关陇、江左诸地代表性作家展开个案分析；下编二章变换视角，分别对隋代之文学批评、诗歌格律化进程进行考查。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这种研究也算得上是多角度、全方位了。虽然如此，但又非平均用力，相比之下，上编由于重在文献爬梳和历史文化分析，重在对南北朝至隋之社会政治背景的把握，所以给人的感觉更为扎实厚重，某些看法也别具深度。比如作者提出自南北朝以来存在两个二元文化体系的架构：其一是永嘉之后，汉文化传统在南北经历了不同继承、演变和发展，由此形成一个南北文化的二元体系；其二是胡族入主中原后不断与中原汉文化和南方汉文化发生关系，由此形成一个胡汉文化的二元体系。而文化的交流，即发生在每一文化体系内和两个文化体系之间，并由此形成北魏分裂后的三个不同文化圈。这一看法，既有相关史实做依托，又得到了系统论证，因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作者以此理论为出发点，来宏观南北朝至隋这一历史过程的文化发展大势，进而考察其文学的动态进程，其脉络也就较前人清晰了许多。

既重历时性考察，又重共时性考察，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考论，是这部书的另一特点。我们知道，陈寅恪先生曾对关陇、山东、江左三大政治文化集团有过精到的论述，此后西北大学的李浩教授更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的专著中将此一问题向前大幅推进。但作者不为所限，而能在前贤基础上拓展视野，既关注三大集团的文化渊源及其权力博弈，又聚焦于特殊文化背景下各集团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创作特点和文学风貌，并从两个方面提出新见解：其一，不同意一些学者关于文帝、炀帝两朝因对山东、江左文化或排斥或提倡，遂导致隋代文学创作水平前低后高的意见，明确指出事实恰恰相反，隋代文学不仅在文帝时期取得高于后期的整体成就，而且还呈现出三类突出的群体性文学风貌，即山东逐臣的草泽怨刺之词、江左降虏的南冠之诗、关陇武将的雄豪之声。其二，针对传统研究中多重南朝而轻北朝的倾向，将其考察重心转向北朝，用较长的篇幅来梳理隋代文学的北方渊源，由此形成对山东、关陇两系较前人更为深细的描述，认为北朝文学（尤其是前期）风貌异于南朝文学的一大要因，在于北方汉族士人在艰难生存环境下缺乏文学创作空间，在文化渊源上更多地继承南渡以前、汉魏西晋之学术文化遗产，由此导致他们在文体取向、语言艺术素养、文化精神等方

面衍生出自己的特色。此后虽经南风熏陶，诗赋类作品增多，语言也渐趋华丽，但其源自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却始终不绝，并在环境的刺激下不断顽强地表露出来。此一见解，我以为根据可靠，眼光敏锐，既对研究对象之认知不无意义，也对不同时期地域文学之考察具有启发性。

诚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隋代文学只是短暂的一瞬，也存在前边说过的若干常被人忽略的“不足”。可是，如同作者认为的那样，这些“不足”，不仅不应成为其缺乏研究价值的理由，反倒应该成为入思的契机。事实上，作为六朝之结束，唐朝之先声，隋代文学既承上启下，又独具特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尚待进一步开掘的文化空间也是颇为广阔的。大概正是基于此一原因，我认为这部专论隋代文学的著作格外值得重视；同时，也希望建国君能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日后倘有余暇和精力，可在已有基础上，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对这一课题作出持续的更深入的思考和推进。

尚永亮，癸巳初夏匆笔于珞珈山麓

目 录

引言	(1)
----------	-----

上 编

第一章 统一的帝国:新文学环境之形成	(9)
第一节 文化整合的趋向:南朝化	(10)
第二节 隋代文化整合中的两个二元体系	(14)
第三节 以长安为中心的文人汇聚与文化交流	(23)
第二章 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与士人群体的命运浮沉	(33)
第一节 北周及隋文帝朝关陇集团对山东士人的压制	(33)
第二节 隋文帝革新文风的政治解读	(41)
第三节 江左士人入隋初期的生存境遇	(44)
第四节 夺嫡之争与王子集团成员状况	(48)
第五节 关陇集团的内部权争	(54)
第六节 炀帝朝的权力分配与士人群体的命运变化	(57)
第三章 隋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两朝三地	(61)
第一节 时代的遗憾	(61)
第二节 文帝朝文学概況	(67)
第三节 炀帝朝文学概況	(81)
第四节 两朝文学之比较及文学史的启示	(91)

第四章 隋代文学溯源	(98)
第一节 山东文学渊源:北魏—北齐文学	(100)
第二节 关陇文学源流	(128)
第三节 江左文学渊源	(145)

中 编

第五章 隋代山东代表作家研究	(155)
第一节 卢思道	(155)
第二节 薛道衡	(171)
第三节 孙万寿与其他山东诗人	(179)
第六章 关陇代表作家研究	(186)
第一节 杨素	(187)
第二节 杨广与其他关陇作家	(198)
第七章 隋代江左作家研究	(218)
第一节 南冠之思与南冠之诗	(218)
第二节 虞世基、王胄等江左作家	(225)
第三节 早期入隋之江左文人	(231)

下 编

第八章 隋代文学批评研究	(237)
第一节 颜之推文学思想与北朝文学之关系	(237)
第二节 李谔《正文体上书》的文化阐释	(249)
第三节 王通以“续诗”为中心的文学观念	(256)
第九章 隋代诗歌格律研究	(266)
第一节 律联、律句、律诗的统计及其规律	(267)
第二节 格律化地域性不平衡的原因简析	(272)

结束语	(275)
附录	(278)
一 隋诗考	(278)
二 隋文考	(288)
三 南北朝诗补遗	(299)
四 隋代文学资料补遗三则	(301)
参考文献	(303)

引 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隋代文学。隋王朝国祚不长，只有短短三十多年。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较少，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别集，几个相对优秀的作家在文学史上也不算特别突出。所以，学术界对隋代文学的研究相对薄弱，至今尚无一部专门的著作。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考虑，作为一个已经发生的文学史环节，对其进行全面详细的研究，以此丰富文学史的整体面貌，无疑是必要的。同时，隋是六朝的结束、唐朝的先声，从六朝文学到唐代文学，它又是一个转换的关键点。弄清隋代文学的存在状况，对我们理解3—9世纪这一“长时段”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隋代文学本身成就的相对不足，不仅不应该成为其缺乏研究价值的理由，相反，可能是我们入思的契机。历史本身并不呈现意义，历史的一切意义都是历史体验者的意识所赋予的。只有我们走进这段文学的历史，它才会向我们走来，并还原其生动鲜活的面目，即使它可能并不壮观。

欲理解隋代文学，必先了解隋代乃至南北朝的历史文化状况。关于这一段历史，研究著作很多。本书在写作中重点借鉴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四书的研究成果。当前对此段文学史的研究，也很重视文化学的视野，并且以南北文化的融合作为理论前提。但是，由于篇幅和论题的限制，往往缺乏比较深细的分析。本书通过对陈寅恪、唐长孺相关论述的比较，重申了唐先生所说的南北文化整合的历史趋势是“南朝化”，并强调文学的南朝化更早更明显。对于文化整合的对象，本书提出南北朝以来存在两个二元文化体系的架构：其一是永嘉之后，汉文化传统在南北经历了不同继承、演变和发展，由此形成的一个二元体系；其二是大量胡族进入中原，在北方建立政权，并不断与中原汉文化和南方汉文化发生关系，由此形成一个胡汉二元文化体系。在每一个文化体系内和两个文化体系之间，文化

的交流早已发生。北魏分裂之后,形成了三个依托于政权形式存在的文化圈,它们都可以涵括在上述两个二元文化结构中。隋代统一之后,文化整合、建立新的国家文化形态势在必行。为了明晰这种文化整合的历史面貌,本书以隋代的音乐体系建设为中心,通过文献的辨析,比较详细地描述了隋代音乐整合的进程中,如何将这两个文化体系的音乐纳入统一的国家音乐系统中。同时,本书也明确指出,在文学、学术等意识文化领域,胡汉文化之间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文学的演变发展必须建立在汉化的基础上,它更多地发生于汉文化内部,而胡族文化则有可能为之灌注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新文化元素。

在此前的研究著述中,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第二十六章《隋代文学》、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二章第二节《隋代三大地域文化的交汇与诗风之变》和第四章《合而未融的隋代诗坛与南北文化的交汇》比较全面,亦有一定深度,可以作为代表。曹、沈基本上按照三大地域文化圈的格局来研究诗人群体,杜氏在此基础上又划分了文帝和炀帝两个时期。他们的研究对本书写作颇具参考价值,其纵横构架也为本书所采用。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初唐诗》中关于南北朝后期直至初唐诗歌主流——宫廷诗的概括和分析,以及作为宫廷诗对立面的个人诗等相关问题的理论阐述,都对本书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并成为本书写作的理论基础之一。

文学创作与文人的心态密切相关,而文人的心态又受到生存境遇的直接影响。隋代统一之后,依然存在着关陇、山东、江左三个政治文化利益集团,他们的代表人物恰恰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体。三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对各文人群体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在此前的研究中,还没有人认真关注过这一问题,并由此导致一些误解和分歧。比如,同样将隋代诗歌的历史分为前后两期,有学者认为由于隋文帝对山东、江左文化持排斥态度,导致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水平不高,而炀帝对南北各地文化的包容态度和对文学的积极提倡,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却认为:由于有感而发、内容充实、题材广泛,主要继承北朝刚健诗风,文帝朝诗歌成就高,而炀帝朝虽并非一无是处,但出现了逆流,成就不及前朝。本书认同后一种评价,并且概括出文帝朝三类突出的文学群体及其风貌——山东逐臣的草泽怨刺之词、江左降虏的南冠之诗、关陇武将的雄豪之声。其中前两者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争斗,后者也与当时的统一战争和边境作战等政治运作密切

相关。当时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和一批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的涌现，与所谓北朝刚健文风的继承以及隋文帝的文风革新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植根于作家由人生命运之变化所导致的生命体验的强化。同样的道理，炀帝朝时，山东文人经过长期的打压，人才凋零，关陇武将也在内部权争中消耗殆尽。江左文人成为政坛和文坛的主角，他们围绕着醉心南朝文化的炀帝，重新回到宫廷文学的老路上。所以炀帝朝的文学创作，除了炀帝本人外，整体成就不如前朝。通过这样的考辨，才能对当时文学的总体状况作出历史的合理解释。为此，本书用专章梳理隋代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士人群体的命运浮沉，以之作为讨论隋代文学格局的历史背景。

适度利用数据统计的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某些宏观文学现象的认识。本书尝试通过对《隋书·经籍志》中所录隋代作家文集状况、《隋书·文学传》作家籍贯、现存隋代诗歌作家籍贯及作品数量等数据的分析，更为直观地呈现当时三大文化群体共存的文学面貌，以及他们在隋代文坛所占的分量。当然，对文学而言，数据的说服力是有限的。比如现存隋诗作者中江左文人最多，作品亦然，但他们的总体成就却不及另两地作家，所以本书只将其作为一个辅助手段。同时，本书还试图对隋代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以及隋代文学的发展对文学史的启示作出自己的解释。

作为一项断代文学史性质的研究课题，对于其渊源的追溯，即使必要，也应该是相对简略的。但本书不惜牺牲结构的匀称合理，用较长的篇幅来梳理隋代文学的北方渊源，对其中山东、关陇两系的描述更是颇费了一些文字。这样处理主要是想表达自己对南北文化、文学融合的理解。南北文化的融合以及文风的交汇是目前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文学的理论前提之一。本书不否认这种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但认为必须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在北方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研究上，避免简单的因果逻辑和刻意求异；二是在南北文学的融合历程上，避免以政治史取代文学史的自身脉络。

由于南朝文学是文学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而北朝文学研究则相对薄弱，所以本书关注的重点在北朝。对北朝文化而言，其实质是北方汉文化与以鲜卑族为主体的胡族文化的结合。对文学而言，游牧民族文化对北朝文学尤其是文学史的主体部分——文人文学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南北朝时期，最能反映南北地域文化色彩差异的文学，莫过于乐府民歌。但是以《鼓角横吹曲》为代表的北朝乐府民歌，对北朝文人文学的影响却很小。现在能见到的，可能只有温子升拟作的一首《白鼻騊》。而这些乐府曲辞，南朝文

人拟作者却相当多，并且完全改变了其原始的风味。这是一种南北文学的交流，但肯定不是学者们预期的南北文学融合。事实上，北朝文人文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对汉文化传统的选择性继承，经过不断学习南朝文学，逐渐发展起来的。何义门曾经说：“邺下才人，亦皆宗仰江左。……思道乐府诸篇，道衡《昔昔盐》、《戏场》诸篇，孰非南朝体乎。……《北史·文苑传》特著诸公者，盖以为北方风雅，实始盛于齐季邺下，以为自是可希风江左，非谓宫体革自卢薛也。卢没于开皇之代久矣，唐初诗歌承隋之后，轻侧淫丽于是稍止，然率宗师徐、庾，上溯沈、谢，无闻别有北宗。”（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何义门评语）如果我们要发现北朝文学的特质，必须对其生存发展的具体历史脉络作详细的辨析。有些人认为，北朝文学风格受到自然及人文环境影响偏于慷慨、刚劲、悲壮等壮美范畴，南北文学融合是两种美学风格的互补。事实上，在南朝文学作品中，何尝不能找到体现这种风格的例子。皎然《诗式》卷四云：“谢吏部‘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于建安？”这些例子都是南朝齐梁以来的诗歌。而现存的北朝作品中又有多少慷慨悲壮之声，能视为普遍风格吗？如果没有作品支持，则只能作为一种文学史的理论设想，而不能成为书写文学史的实在。这方面的研究，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一书和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中的相关章节，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但是在结合现存作品的文学分析方面，仍有可以强化的地方，所以本书一方面借鉴吴、曹二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将重点放在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通过对隋代文学渊源的重新梳理，本书认为：从文学层面来看，北朝文学尤其是前期，之所以呈现与南朝不同的独特风貌，主要是因为北方汉族士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缺乏文学创作的空间，并在文化渊源上更多地继承南渡以前、汉魏西晋之学术文化遗产。由此导致他们在文体的取向（侧重于应用文）、语言艺术的素养（相对质朴）、文化精神（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积极投入、更为率直的抒情姿态和更为浓烈的情感体验）等方面衍生出自己的特色。此后虽经南风熏陶，诗赋之类作品的创作增多，语言也渐趋华丽，但其文化精神却始终不绝，并在环境的刺激下不断表露出来。由此，本书提出一个理论设想：北朝文学的历史传统转化为其地域特征，时间因素沉淀为空间存在，形成不同于南朝的文学气质。另外，本书认为：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早在北魏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当北方文人通过逐步学习南朝文学来提高

他们的创作水平，并在其中展现自身的文化精神时，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已经启动。同样，南朝文人因各种缘故来到北方，在他们的意识中，根本没有所谓不同于南朝文学的北方文学。但是，人生命运的巨大变故和由此感发的生命体验，却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独特的风貌。这又是一种特殊而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文学交融。

由于隋代的几位优秀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突出，所以历来少有专门的研究。隋炀帝、卢思道、杨素等人还有几篇专论涉及，其他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都只能散见于各种文学史和诗史著作中。本书在山东作家中选取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作为代表，关陇作家中取杨素、杨广二人，江左作家中以南陈诗人入关之初的南冠之诗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整体来研究，另取虞世基、王胄作为代表。在研究中，如果保存的文献相对完整，则力求能把握作家的个性，探索其人生经历和创作心态的发展变化，以此来理解其作品。在作品的阅读中，本书借鉴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译本“致中国读者”中的一段话，他说：“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像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当我们确实在阅读中补充了这样的背景，初唐诗就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美。”^①对隋代文学作品，也应该采用这样的阅读方式。同时，本书对具体作品特别重视从两个方面加以观照。其一是文学史的传统和惯例，比如某些乐府诗，在长期的文人拟作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隋代文人在写作中，对同一旧题惯例的突破和不同题辞的选择，往往显示出某种新变的因素。其二，在宫廷文学成为主流趣尚的时代，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笼罩，往往会产生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更值得关注。

本书选取颜之推《颜氏家训》、李谔《正文体上书》、王通《中说》作为研究隋代文学批评的对象。这三种资料不仅是批评史上较有影响的隋代文献，也可视为江左、山东、关陇文学观念的代表。具体论述中，对前人分析得较多的内容，则或省或略，意在发前人所未覆。几乎所有的批评史著作都认为颜之推的文学思想包含南北，但北朝文化究竟如何影响颜氏，却缺乏清晰的说明。通过仔细的梳辨，本书总结出颜氏文学思想与北朝之关系主要表

① [美] 宇文所安著：《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现在对文人品行的苛评、对诗赋与实用文章的文体价值判断、对文人人格“华实论”的建构等三个方面。前人往往只关注李谔《正文体上书》对魏晋以降文学趣尚的批评，而忽略了他的写作意图。李谔的批评意在扭转以文学才华取士的风气，他的观念折射出山东士族所恪守的重经术、励名行的传统门风，并预示了唐代科举中进士与明经两科之争。王通的儒学，强调政道治术，故而推重史学。王通的文学批评受制于他的儒学，不幸的是，他把文学视作史学的附庸，这一点在他的《续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至于他由人品推及文品，进而全盘否定六朝文学的做法，如果认真辨析，不难感受到其中既无逻辑，又显荒诞。

通过考察隋代诗歌的格律，可以发现：在格律化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别。总体而言，江左文人的作品格律化水平最高，山东次之，关陇较为滞后。究其原因，与诗韵所采用的语音体系关系密切。同时，对声韵之学的理论意识也会对诗歌格律化产生直接影响。就隋诗格律的整体而言，似乎尚不及南陈，隋代只是保持着此前历史发展的惯性，没有充分的迹象显示出隋人的自觉追求和明显进步。

上 编
